



解放初期的陈麻井民兵队(下)

1950年2月10日,马绍武在川口地区被解放军活捉,此事张海禄浑然不知。2月11日,派匪徒纳自新、尹村保到海原高崖庙山(时称小台湾)找马绍武联系。3月9日,马绍云一伙匪徒与张海禄在常乐堡近山羊圈会合,张海禄带上众匪徒和藏匿在县城东关安仲和家的小老婆,连夜离开常乐,经中卫香山寺口子向同心方向转移。安仲和系中卫县哥老会头子,其匪徒、资匪活动已被县军管会掌握,张海禄离开常乐堡的事随即被发现并通知了香山游击队。

1950年3月10日晨,奔波了一夜的海原匪徒在寺口黄色水山坡下休息吃饭,香山游击队焦生和等10多名游击队员的枪响了,一名放哨的土匪先被击毙。随后,张海禄的小老婆也被击毙,众匪徒匆忙还击。张海禄不敢恋战,将小老婆驮在马上狼狈逃命。

张海禄带领马绍武派来的马绍云等匪徒狼狽逃窜到海原,网罗马绍武溃散的匪徒,并与残留在西北的潜伏特务梅书成(陕西胡宗南的参谋长)、马云山(青海马步芳八十二军旅长)遥相呼应,大造声势,煽动、裹胁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随叛乱,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匪势一度嚣张,匪徒最多时达200余人。

在宁西公路同心(心)固(原)段方圆一百余华里的半径上,袭击人民解放军达六次之多,打死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数十人,抢劫长短枪数十支,抢劫过往商旅财产无数,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50年6月5日,张海禄乘驻马家河湾的骑4连大多数人到喊叫水撒卜郎塘(也称撒不拉滩或三不拉滩)种地之机,集合全体匪众围攻马家河湾骑4连驻地。骑4连一个留守班利用夜暮英勇抵抗。陈麻井民兵听到枪声,知道土匪偷袭马家河湾驻军,立即通知全队30多名民兵与驻陈麻井的1连一个排统一行

动,于天亮前赶到马家河湾西岸,向正在偷袭骑兵4连驻地的土匪猛烈开火。这时土匪已占领关店,缴了过路的独1师住店人员的武器,抢了驻店的车,正在挖4连的营盘。骑4连留守班已牺牲2人,受伤3人,子弹也打光了,情况十分危急。陈麻井民兵和骑1连及时赶到,使土匪大吃一驚,他们以为是大队来了,站在屋顶上向是分散射击的一个土匪大喊:解放军来了,快撤。张海禄等匪众抛下死伤匪徒,率众向东南方向逃去。

1950年6月14日黄昏,张匪率部在西山窑劫掠乡政府,打死黄乡长的胞弟。解放军以骑兵、步兵四个连的兵力,分三路包剿,但张匪在得手后迅即转移。20日,侦察到张匪在黄谷川一带抢劫,解放军决定围而歼之,但张匪又提前逃出。独一师马参谋长带领骑、步兵四个连咬住不放,跟踪追击,从海原的兴仁堡追到甘肃靖远的打拉池,张海禄对甘肃地形不熟又折返海原,剿匪部队又追回到海原。前后紧追八天八夜,行程千里,张匪疲于奔命,无处藏身,被迫逃回老巢——海原县黄谷川。此时,许多匪徒被迫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只好缴械投降。但在大批投降的匪徒中,唯独没有张匪。

解放军剿匪部队经过一连几天搜山,仍未发现可疑之处。一天,搜山部队发现一个小孩背着筐,神色不安地往山上爬,筐里装有五个大锅盔,引起战士们怀疑,便把这个小孩带到连部询问。开始,孩子不敢说老实话,一口咬定是自己上山割草的干粮,后经启发教育,他才承认是给土匪送的,并表示愿意带路。

在一条长满齐腰深绿草的山沟里,小孩指着一个比井口稍大的山洞说:“土匪就在里面。”

解放军随即向洞里喊话,叫他们出来投降,但喊了半天,却

毫无动静,排长采用投石问路的办法,往洞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土匪误认解放军进洞,便朝洞外开枪。

排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要填洞,把你们闷死在里面。”

一边喊话,一边往洞里铲土,土匪们只好扔出武器,爬出洞。张海禄等8名匪徒束手就擒。

1951年2月18日,张海禄在中宁被人民政府枪决,危害一方的政治土匪头目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50年秋天,在从吴忠到靖远的公路上,有土匪沿路抢劫,一天傍晚,同心县商人马有智的车把式找到陈麻井民兵队,说他们的车在陈麻井二道冲子被土匪抢了,这股土匪有3个人赶3头驴,带1支长枪、1支短枪,抢走2匹马、2卷布、100多元钱和一些花生。民兵队找侯安国商议,住在侯安国院里的周满祥提出要去追捕。周满祥原是同心县桃山村人,早年从马鸿宾部队退回家,领个团副衔,曾在桃山、陈麻井地区带2个班的兵,负责一带的交通安全,防范土匪活动。1949年10月驻马家河湾的解放军搜查国民党散兵时,对他作了审查,收缴了枪支弹药,解散了队伍,同时鼓励他继续关心地方保安工作。他自己觉得与附近惯匪结下了冤仇,回桃山老家不利,就寄住在陈麻井民兵侯安国家里,周满祥认为追捕这个土匪很有把握,当场对杨生银和侯安国说,我领你们去追。民兵队即分头准备。次日凌晨,杨生银、周满祥、侯安国等10多名民兵,背着枪、骑着马,沿包兰公路向南急驰而去,过了二道冲子,他们看到沿途扔着花生皮,马有智的车把式一看,认为就是土匪抢去的花生。民兵队顺着这一线索一直追到石圈,这时天色已暗,大家很疲,张杨生银累得走不动了。周满祥到附近羊圈一打听,那3个土匪刚从新型

的山地走过,到北沿口去了。他估计这三个土匪住在北沿口,第二天要过兴仁堡,便写了个条子交给马有智的车把式,又找到圈上一个可靠的羊把式,让他们连夜赶到兴仁堡,把信交给开店的周拐子。

周拐子曾是周满祥的副官,早年退役在兴仁堡开店。他接信后,到附近税务局找领导说明情况,借了三个土堡,预先准备拦截。同时,他又让女儿在日出前,上屋顶观察。兴仁堡周围是一大片平川,视线非常好,不一会儿,果然从西北老远处过来了3个赶驴的人。远远地周拐子就看清,那3头驴是一黑、一青、一麻,一个骑鞍,两个驮鞍,与周满祥信上说的一样。周拐子立即背上枪在堡外一个小山湾等着。这三个土匪刚从山湾走来,周拐子就从背后跳出来,朝天开了一枪,大声喊:站住,举起手来。土匪被枪声和喊话声镇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因土匪也有枪,如果让土匪拿到枪,稍不留神,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拐子一人,不好动手下手土匪的枪,只好先进行盘问。正盘问中,后面走来一个中宁人。周拐子叫中宁人把这3个人的枪下了,然后绑上押回堡子交给山上,由山上押送到海原县公安局进行调查审问。后经海原县公安局查证,这3个土匪中有2个灵武人,一个靖远人。他们从灵武到靖远沿途抢劫,就地销赃,前不久还杀了一个老乡。这次没想到栽到了陈麻井民兵队的手里。

陈麻井民兵队的成立,是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保家护路,维护一方民众生命财产,配合人民解放军剿匪肃特的光辉典范,不但为陈麻井周边地区社会稳定,银平路的畅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后来中宁县民兵组织建设、军事建设、思想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据《中宁文史资料》)

银川市妇女解放新篇章(下)

银川市于1953年3月6日至4月18日在汉民集居区、街中开展了一场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宣传教育工作。市委还召开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运动大会。大会指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反封建残余思想的斗争,也是一场重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和历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同样重大意义。

经过历时三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新的婚姻制度,婚姻自由、自主、自愿、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更多的青年男女走上了自由婚姻之路,包办买卖婚姻减少,许多寡妇摆脱了封建束缚,敢于改嫁,重新建立家庭。据统计,1950年,全市受理婚姻案件共2075件;1951年,全年受理婚姻案件184件;1952年半年,受理婚姻案件174件。其中离婚案件占80%以上。这些大多系女方提出,原因大多数是因为解放前由父母包办,感情不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族妇女砸碎身上的封建枷锁,获得了政治地位、经济权利,社会和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她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各项社会活动。

配合政府肃清匪特,镇压反革命,开展劳军、拥军活动。银川市三区七街组织妇女纷纷给刚入城的解放军官兵让住房,拆洗被褥2500条,做枕头500个,缝棉衣1.2万套。在镇反运动中广大妇女帮助政府检举、逮捕、监视反革命分子,出现了许多大义灭亲的事迹。如永宁县五区妇女牛兰香等4人,抓住了作恶多端的一贯道头子刘希林,六区妇女马阿名抓住了由兰州回来的马匪大特务、便衣队长鲍生奎,都及时送到了乡政府或公安部。

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宣传,妇女们活跃在街头巷尾,针对反革命分子散布

的恐美、崇美的欺骗宣传,向群众进行仇视、蔑视和鄙视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不少妇女动员丈夫、子女、兄弟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1952年春节,妇女们通过写慰问信、做慰问袋和针线包等方式对烈军属进行慰问,并捐人民币8.5万元。

成立城市妇女生产建设大队,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市妇联动员600余名城市妇女报名参加,组成7个生产建设分队,从事建筑、养鸡养鸭、开荒种地,还组织妇女进行分散的多种多样小型生产。对部分无法生活的贫苦妇女,由各街妇联组织了14个洗衣小组。如:四区梁大娘、一区刘大娘(均为街妇联主任)等不辞劳苦给组员找活干,帮她们解决了困难。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月中,全市掀起了搞卫生高潮,各街妇女在街妇联的领导下,不论是个人卫生还是环境卫生,都做得认真彻底。据统计,共打扫房子25284间,拆洗被褥8.3万床,打绳子3050余万根,捉老鼠1.7万只,修街96条,填污土坑562个,清除垃圾16627车,拔杂草168万斤;郊区修厕所355所,修井157眼。

积极投身土改,“三反”“五反”运动。据土改中统计,郊区参加农会的女会员2136人,占农会会员总数的20.6%;参加民兵的妇女104人,占民兵总数的13%,涌现出妇女积极分子233人。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妇女积极揭发、检举各种犯罪行为,组织“规劝组”,参加“打虎队”同资产阶级的“五毒”进行坚决斗争。仅银川市就有400余名妇女经常参加战斗。

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选举人民代表是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妇女的一件大事,这是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银川市1953年参加选举的妇女选民占女选民总数的95%,被选为代表的有17人,占代表总数的16%。

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土地改革以后,农业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当时还只是在分散的个体

经济,很难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只有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宁夏地区1955年下半年99%的农户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宁夏妇女70%至80%都是农村妇女,她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土改和其他各项政治运动,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因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们也是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有些妇女还起了先锋带头作用。1952年,仅惠安、银川两区统计,由妇女组成的4899个临时性季节变工组中就有56896名妇女参加,155个长期变工组中就有2599名妇女参加,1390个男女混合组中,亦有妇女5704人。广大妇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不但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中也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许多妇女都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在1952年开展的生产运动中,妇女起了很大作用,她们除了承担家务劳动外,还参加除草、收割、挖渠、积肥、送粪等劳动,在劳动中涌现出了很多模范人物。为了发展生产,使人力、物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提出“自愿结合、互助互利、民主管理”三大原则,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互助组成立后,绝大部分妇女都踊跃参加,并在生产中起了积极带头作用,大批妇女战斗在生产第一线。

解放前,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享受不到什么文化教育,劳动妇女那就更谈不上念书学习文化了。解放后,随着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大翻身,文化、卫生和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掀起妇女学习文化的热潮。许多妇女深感到过去受压迫的痛苦和没有文化的艰难,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学习文化摘掉文盲帽子。然而由于旧思想的影响,妇女这种正当的学文化的迫切心情得不到父母公婆和丈夫的支持,相反还要受到各种非法手段的阻碍。党和政府号召各级基层组织、政府

机关、学校大力宣传扫盲工作的重要性,动员妇女到夜校、扫盲班、速成识字班学习。在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和组织领导下,除了正规学校的妇女学员大大增加外,夜校、扫盲班、速成识字班的学员也不断增加。银川市妇联与有关部门协同于1952年底组织夜校26个,速成识字班11个,参加学习的妇女有1536人。绝大多数妇女有极大的学文化热情,经过短时间的学习,一般学员都能识300个左右的字,不少人已识1000个左右的字,过去的睁眼瞎也变得会看报纸、能写简单的信和记一些账。银川市在1953年还办起了第一期基层干部培训班,培训干部104名,妇女占80%,还经常开展学习文化竞赛,广开就业门路。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积极热情地参加学习文化,妇女的文化面貌开始改观。夜校、冬学、识字班都可以见到成群结队的妇女。1954年上半年,银川市参加业余学习的11245人中,妇女就有9960人,占86%。妇女学文化,显示了广大群众向科学文化进军的伟大力量,也显示了妇女即将在文化科学方面得到彻底翻身。

重视妇幼保健工作。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由于不重视人民的福利事业,鄙视妇女,人民群众的疾病发病率、婴儿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从1950年起,首先在银川建立了妇幼保健站,逐步贯彻新法接生。但由于过去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许多妇女对新法接生顾虑重重,生产时仍采取卷席子、铺沙子,以及跳神画符等极不科学的办法。为了改变这种迷信、落后的认识,各级政府都大力开展新法接生的宣传工作,加紧培训妇幼保健工作人员,通过举办展览会,召开家长会,组织母亲会等形式给广大群众讲科学道理。通过这些工作,使新法接生逐步深入人心,并被群众接受。

(据《银川党史》)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下)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边区政府在创办教育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师资队伍的建设。面对师资严重短缺问题,1938年高小毕业的教师占48%,高小肄业及初小毕业的占21%,边区政府采取“培养”“改造”“包容”“开放”并重策略,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提高待遇和政治地位。提高待遇方面,颁布《小学教员待遇保障法》,规定教员薪金优先发放;提升政治地位方面,鼓励教员兼任乡文化教员,参与干部会议;二是加强多途径培训,以培养抗战急需的师资力量。举办寒暑假教师培训班,促进校际交流;通过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等专业学校,系统培训教师;三是改造旧的知识分子,为小学教育所用。对原有私塾先生进行思想改造,使其接受新民主主义教育理念。四是面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专家采取包容开放政策,动员退伍军人、进步青年加入教师队伍。

创新多样化办学模式

边区小学教育因地制宜,探索出多种办学形式。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大会上指出:“我们的教育不仅要集中的正规的中学和小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等形式,不仅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这一指示的引导下,边区小学分为公办小学和民办小学两种类型:公办小学中,主要有初级小学、完全小学、模范小学、中心小学、干部子弟小学及少数民族小学等多种类型;民办小学中,根据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原则,1944年边区教育厅决定实施“民办助政”政策,鼓励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创办学校,实行自我管理。这样除固定的全日制小学外,进行了群众组织创新,实行弹性学制。在偏远山区推行“巡回小学”,教师定期到各村授课;冬季农闲时开办“冬学”,方便农民子女学习。这些模式有效解决了地域分散、学生流动性大的问题,显著提高了入学率。具体而言,边区各地创造了多种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形成了几种典型模式:一是米脂高家沟模式。由群众自发创办,推荐当地有威望人士担任校长,教员由群众推荐,政府考核任命。课程设置紧密结合农村需要,注重珠算、记账、写信等实用技能。二是延安杨家湾模式。由劳动英雄发起

创办,采取“一揽子”形式,既是儿童学校,又是成人夜校和识字组,还兼办合作社,实现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三是巡回学校。一名教师巡回教授几个村庄的学生,适应地广人稀地区的教育需求。

从“文化荒漠”到“希望田野”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变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教育规模的显著扩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边区小学数量增至2297所,学生人数达7.5万人,入学率提升至61%。边区还建立了延安保育小学、行知中学附小等一批示范学校,成为教育改革的标杆。二是社会风气的深刻转变。小学教育的普及推动了边区社会风气的革新。通过教育,群众抗日救国意识显著增强,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三是人才培养的丰硕成果。边区小学教育为抗战与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是对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传承与发扬。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纲领中,对新中国的教育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新中国的教育与边区教育在性质、指导思想和教育方针上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党在陕甘宁边区教育政策的传承与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这段历史证明,即使最贫瘠的土地,也能培育出最富生命力的教育之花。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变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伟大教育实践。它不仅改变了边区教育落后的面貌,更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这段历史证明,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扎根人民、服务社会。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据《团结报》)

红果子长城错位之谜

中国的万里长城举世闻名,在石嘴山市惠农区,同样有一条雄伟壮观的长城引人注目。长城倚雄伟的贺兰山蜿蜒而下,由西向东与滔滔黄河接壤交汇,远远看去像一条黄龙出山,龙头昂首悬在贺兰山腰,龙身淌过宁夏黄河平原,龙尾直入黄河水中,这就是宁夏乃至全国和世界最著名的一段明代长城,即长城错位遗址。

宁夏有战国秦长城、隋代长城和明代长城。而保存较为完整、分布较广的就是明代长城。惠农区境内的旧北长城,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弘治以前,《宁夏风物志》《塞上江南》都有记载。据《九边考》载“宁夏北,皆靠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说的就是旧北长城。在古代,宁夏是东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蒙古铁骑征战西夏王国和西域的主要战场和必经之路。惠农区处在宁夏与内蒙古的交界处。古代关内统治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修筑城墙抵御来自蒙古铁骑、突厥与匈奴的侵袭。纷纷依山傍水大动土木,修筑工事,阻挡铁骑的入侵。惠农区境内的明长城就是进入宁夏北端的第一道长城防线。宁夏境内的明长城,都是用黄土、沙石夯筑而成,俗称土长城。土长城一般高3米到4米之间,宽度为60公分左右。

惠农区境内最著名的旧北长城上的一段长城地震错位遗址是如何被人发现?而长城错位遗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20世纪70年代初,香港《文汇报》刊载了美国地质专家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大陆西北地区一段长城上,发现了一处因地震和地壳运动造成的长城断裂错位,对于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地壳运动、地震动态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报道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有关专家的重视和关注。1974年,国家地震局负责同志和专家到此视察后认为该断层对于研究和观测地震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惠农区地貌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依次排列着贺兰山地、洪积倾斜平原、黄河冲击平原和鄂尔多斯台地4个地貌带。而惠农区境内的旧北长城,就坐落在这4个地貌之中,在这4个地貌带之间,有一条地震带,从南到北,长达数百公里。而旧北长城的地震错位正好反映了地震板块相运动的特点。

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一地震错位造成的原因,宁夏地震局于1975年拨款专款在旧北长城地震错位遗址四周,建起了地震观察站,盖起了地震观测室、挖了地震监测探槽、设立了19个基桩线,又对错位遗址实施了围栏保护。该监测点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结束。因该地震带一直保持稳定,再未发生地震,再进行相对和检测已失去意义,后地震台等部门撤离了该检测站。

惠农区明长城地震错位遗址,位于长城龙头贺兰山上的烽火台顺长城的龙身向东200米处,错位处上段长城和下段长城上下垂直错距0.9米,水平错距1.54米。中国科学院早在1965年调查平罗1739年大地震影响时,就发现了此处长城错位遗址。1980年9月,在宁夏召开中国地质活动断层层古地震学术研讨会时,120位学者还专程到惠农区用旧北长城错位遗址进行考察。

今天的旧北长城已变为历史的记载,它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增长知识,提高了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据《石嘴山往事》)